

魯迅語錄選

葉 子 目 錄

不通兩種……	一
中國文壇上的鬼魅……	五
玩笑只當牠玩笑（下）……	一七
論『第三種人』……	二一
二丑藝術……	二九
戰士和蒼蠅……	三三
夏 三 虫……	三五
學界的三魂……	三九
送竈日漫筆……	四五
『死 地』……	五一

第二輯提要

- 一、這一輯所選的文字，包含兩個時期，一是北京時代的，二是內戰時期的。
- 二、北京時代的所謂正人君子，由陳西滢以至章士釗，內戰時期的民族主義文學者黃震遐之流，第三種人杜衡以至幽默大師林語堂等，不妨說都是反動政府的御用文士的普通代名詞。
- 三、對於正人君子們的批評都收在華蓋真正續編裏，但所有正面論戰的文章，因嫌過長，略去不選，所選的都是短小的形象化的文章，即用具體的形象來揭穿官場學者的險的短評。
- 四、對於民族主義文學，第三種人文學和幽默文學的批評，散見於自由書以下各書，這裏所選的幾篇，都是有代表意義的，文章有的質直，也有的含糊，難解的地方，都加以註明。
- 五、曾幾何時，而魯迅當日所攻擊的人物，有的已經不知到那裡去了，大概是永遠沉沒到地獄裏去了，如民族主義文學的英雄們。有的在抗戰中當了日本的奴子，如第三種人杜衡之流，也由此更顯出標榜爲超於階級超於政治的文學原是什麼東西。有的早年原是段政府的官僚學者，日下却又共蔣政府的達官顯宦，如陳西滢章士釗的同僚。關於幽默大師林語堂，好像不再講什麼幽默，然而他竟又躲進遠遠的美國，在高談東方文明，在反對共產主義，來博醉飽了的美國士女們的歡笑，但同時所謂幽默也者，也由此更露出了牠的本來面目來了。
- 六、讀了這些，好像溫習一下歷史，看看官場學者究竟是怎樣的東西，這也是很有益處的。

魯迅活葉文選

(一輯之二)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出版)

張家口魯迅學會 選註

新華書店 印行

不通兩種 (註1)

人們每當批評文章的時候，凡是國文教員式的人，大概是着眼於『通』或『不通』，中學上雜誌上還爲此設立了病院。然而做中國文其實是很不容易『通』的，高手如太史公司馬遷 (註2)，倘將他的文章推敲起來，無論從文字、文法、修辭的任何一種立場去看，都可以發見『不通』的處所。

不過現在不說這些；要說的只是在籠統的一句『不通』之中，還可由原因而分爲幾

種。大概的說，就是：有作者本來還沒有通的，也有本可以通，而因了種種關係，不敢通，或不願通的。

例如去年十月三十一日大晚報的記載『江都清賦風潮』，在『鄉民二度興波作浪』這一個巧妙的題目之下，述陳友亮之死云：

『陳友亮見官方軍警中，有携手槍之劉金發，竟欲奪劉之手槍，當被子彈出膛，飲彈而斃，警察隊亦開空槍一排，鄉民始後退。』……

『軍警』上面不必加上『官方』二字之類的費話，這裡也且不說。最古怪的是子彈竟被寫得好像活物，會自己飛出膛來似的。但因此而累得下文的『亦』字不通了。必須將上文改作『當被擊斃』纔妥。倘要保存上文，則將末兩句改爲『警察隊空槍亦一齊發聲，鄉民始後退，』這纔銖兩悉稱，和軍警都毫無關係。——雖然文理總未免有點希奇。

現在，這樣的希奇文章，常常在刊物上出現。不過其實也並非作者的不通，大抵倒是恐怕『不准通』，因而先就『不敢通』了的緣故。頭等聰明人（註？）不談這些，就成

了『爲藝術而藝術』家；次等聰明人竭力用種種法，來粉飾這不通，就成了『民族主義文學』者，但兩者都是都屬於自己『不願通』即『不肯通』這一類裏的。

（一九三三年二月三日）

（註1）

這篇文章用最精鍊的形式來諷刺國民黨御用的兩個文學流派，這兩個流派，一是爲藝術而藝術的第三種人文學，二是所謂民族主義文學。

（註2）

司馬遷是西漢人，中國一個最著名的史學家，著有史記。

（註3）

『頭等聰明人』，聰明人這三個字，應當讀作奴才的意思。

（選自魯迅三十年集：偽自由書）

空白页

中國文壇上的鬼魅 (註1)

當國民黨對於共產黨從合作改爲剿滅之後，有人說，國民黨先前原不過利用他們的，北伐將成的時候，要施行剿滅是預定的計劃。但我以爲這說的並不是真實。國民黨中很有些有權力者，是願意共產的，他們那時爭先恐後的將自己的子女送到蘇聯去學習，便是一個證據，因爲中國的父母，孩子是他們第一等寶貴的人，他們決不至於使他們去練習做剿滅的材料。不過權力者們好像有一種錯誤的思想，他們以爲中國只管共產，但他們自己的權力卻可以更大，財產和姨太太也更多；至少，也總不會比不共產還要壞。

我們有一個傳說。大約二千年之前，有一個劉先生，積了許多苦功，修成神仙，可以和他的夫人一同飛上天去了，然而他的太太不願意。爲什麼呢？她捨不得住着的房子，養着的雞和狗。劉先生只好去懇求上帝，設法連老房子，雞，狗和他們倆全都弄到

天上去，這才做成了神仙。也就是大大的變化了，其實卻等於並沒有變化，假使共產主義國裡可以毫不改動那些權力者的老樣，或者還要闊，他們是一定贊成的。然而後來的情形證明了共產主義沒有上帝那樣的可以通融辦理，於是纔下了剿滅的決心。孩子自然是第一等寶貴的人，但自己究竟更寶貴。

於是許多青年們，共產主義者及其嫌疑者，左傾者及其嫌疑者的朋友們，就到處用自己的血來洗自己的錯誤，以及那些權力者們的錯誤。權力者們的先前的錯誤，是受了他們的欺騙的，所以必得用他們的血來洗乾淨。然而另有許多青年們，卻還不知底細，在蘇聯學畢，騎着駱駝高高興興的由蒙古回來了。我記得有一個外國旅行者還曾經看得酸心，她說，他們竟不知道現在在祖國等候他們的，卻已經是絞架。

不錯，是絞架。但絞架還不算壞，簡簡單單的只用絞索套住了頸子，這是屬於優待的。而且也並非個個走上了絞架，他們之中的一些人，還有一條路，是使勁的拉住了那頸子套上了絞索的朋友的脚。這就是用事實來證明他內心的懺悔，能懺悔的人，精神是

極其崇高的。(註2)

二

從此而不知懺悔的共產主義者，在中國就成了該殺的罪人。而且這罪人，卻又給了別人無窮的便利；他們成爲商品，可以賣錢，給人添出職業來了。而且學校的風潮，戀愛的糾紛，也總有一面被指爲共產黨，就是罪人，因此極容易的得到解決。如果有誰和有錢的詩人辯論，那詩人的最後的結論是：共產黨反對資產階級，我有錢，他反對我，所以他是共產黨。於是詩神就坐了金的坦克車，凱旋了。

但是，革命青年的血，卻澆灌了革命文學的萌芽，在文學方面，倒比先前更其增加了革命性。政府裏很有些從外國學來，或在本國學得的富於智識的青年，他們自然是覺得的，最先用的是極普通的手段：禁止書報，壓迫作者，終於是殺戮作者，五個左翼青年作家，就做了這示威的犧牲。然而這事件又並沒有公表，他們很知道，這事是可以做

，卻不可以說同。古人也早經說過，『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註3）所以要興辦革命文學，還得用文學的武器。

作為這武器而出現的，是所謂『民族文學』。他們研究了世界上各人種的臉色，決定了臉色一致的人種，就得取同一的行爲，所以黃色的無產階級，不該和黃色的有產階級鬥爭，卻該和白色無產階級鬥爭。他們還想到了成吉思汗，作為理想的標本，描寫他的孫子拔都汗，怎樣率領了許多黃色的民族，侵入翰羅斯，（註4）將他們的文化摧殘，貴族和平民都做了奴隸。

中國人跟了蒙古的可汗去打仗，其實是不能算中國民族的光榮的，但爲了撲滅翰羅斯，他們不能不這樣做，因爲我們的權力者，現在已經明白了古之翰羅斯，即今之蘇聯，他們的主義，是決不能增加自己的權力，財富和姨太太的了。然而，現在的拔都汗是誰呢？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佔據了東三省，這確是中國人將要跟着別人去毀壞蘇聯的序

曲，民族主義文學家們可以滿足的了。但一般的民衆卻以爲目前的失去東三省，比將來的毀壞蘇聯還緊要，他們激昂了起來。於是民族主義文學家也只好順風轉舵，改爲對於這事件的啼哭，叫喊了。許多熱心的青年們往南京去請願，要求出兵；然而這須經過極辛苦的試驗，火車不准坐，露宿了幾日，才給他們坐到南京，有許多是只好用自己的脚走。到得南京，卻不料就遇到一大隊曾經訓練過的『民衆』，手裡是棍子，皮鞭，手鎗，迎頭一頓打，使他們只好臉上或身上腫起幾塊，當作結果，垂頭喪氣的回家，有些人還從此找不到，有的是在水裡淹死了，據報上說，那是他們自己掉下去的。

民族主義文學家們的啼哭也從此收了場，他們的影子也不見了，他們已經完成了送喪的任務。這正和上海的葬式行列是一樣的，出去的時候，有雜亂的樂隊，有唱歌似的哭聲，但那目的是在將悲哀埋掉，不再記憶起來；目的之一達，大家走散，再也不會成什麼行列的了。

三

但是，革命文學是沒有動搖的，還發達起來，讀者們也更加相信了。

於是別一方面，就出現了所謂『第三種人』，是當然決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於左右之外的人物。他們以爲文學是永久的，政治的現象是暫時的，所以文學不能和政治相關，一相關，就失去牠的永久性，中國將從此沒有偉大的作品。不過他們忠實於文學的『第三種人』，也寫不出偉大的作品。爲什麼呢？是因爲左翼批評家不懂得文學，爲邪說所迷，對於他們的好作品都加以嚴酷而不正確的批評，打擊得他們寫不出來了。所以左翼批評家，是中國文學的劊子手。

至於對於政府的禁止刊物，殺戮作家呢，他們不談，因爲這是屬於政治的，一談，就失去他們的作品永久性了；況且禁壓或殺戮『中國文學的劊子手』（註5）之流，倒正是『第三種人』的永久的文學，偉大的作品的保護者。

這一種微弱的假惺惺的哭訴，雖然也是一種武器，但那力量自然是很小的，革命文學並不爲牠所擊退。『民族主義文學』已經自滅，『第三種文學』又站不起來，這時候

，只好又來一次真的武器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海的藝華影片公司突然被一羣人們所襲擊，搗毀得一塌胡塗了。他們是極有組織的，吹一聲哨，動手，又一聲哨，停止，又一聲哨，散開。臨時還留下了傳單，說他們的所以征伐，是爲了這公司爲共產黨所利用。而且所征伐的還不止影片公司，又蔓延到書店方面去，大則一群人闖進去搗毀一切，小則不知從那裡飛來一塊石子，敲碎了值洋二百的窗玻璃。那理由，自然也是因爲這書店爲共產黨所利用。高價的窗玻璃的不安全，是使書店主人非常心痛的。幾天之後，就有『文學家』將自己的『好作品』來賣給他了，他知道印出來是沒有人看的，但得買下，因爲價錢不過和一块窗玻璃相當，而可以免去第二塊石子，省了修理窗門的工作。

四

壓迫書店，真成爲最好的戰略了。

但是，幾塊石子是還嫌不夠的。中央宣傳委員會也查禁了一大批書，計一百四十九種，凡是銷行較多的，幾乎都包括在裡面。中國左翼作家的作品，自然大抵是被禁止的，而且又禁到譯本。要舉出幾個作者來，那就是高爾基（Gorky）盧那卡爾斯基（Lunacharskiy），斐因（Fein），法捷耶夫（Fadjev），綏拉斐摩維文（Serafimovich），辛克萊（Upton Sinclair），甚而至於梅道林克（Meatrink），梭羅古勃（Sologub）斯忒林培克（Stridberg）。（註+）

這真使出版家很爲難，他們有的是立刻將書繳出，燒燬了，有的却還想補救，和官廳去商量，結果是祇除了一部分。爲減少將來的出版的困難起見，官員和出版家還開了一個會議。在這會議上，有幾個『第三種人』因爲要保護好的文學和出版家的資本，便以雜誌編輯者的資格提議，請採用日本的辦法，在付印之前，先將原稿審查，加以刪改，以免別人也被左翼作家的作品所連累而禁止，或印出後始行禁止而使出版家受虧。這提議很爲各方面所滿足，當即被採用了，雖然並不是光榮的拔都汗的老方法。

而且也即開始了實行，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設立了書籍雜誌檢查處，許多『文學家』的失業問題消失了，還有些改悔的（註7）革命作家們，反對文學和政治相關的『第三種人』們，也都坐上了檢查官的椅子。他們是很熟悉文壇情形的；頭腦沒有純粹官僚的胡塗，一點諷刺，一句反語，他們都比較的懂得所含的意義，而且用文學的筆來塗抹，無論如何總沒有創作的煩難，於是那成績，聽說是非常之好了。

但是，他們的引日本爲榜樣，是錯誤的。日本固然不准談階級鬥爭，卻並不說世界上並無階級鬥爭，而中國則說世界上其實無所謂階級鬥爭，都是馬克斯捏造出來的，所以這不准談，爲的是守護真理。日本固然也禁止，刪削書籍雜誌，但在被刪削之處，是可以留下空白的，使讀者一看就明白這地方是受了刪削，而中國卻不准留空白，必須連起來，在讀者眼前好像還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只是作者在說着意思不明的昏話。這種在現在的中國讀者面前說昏話，是弗理契（F. H. Hill）盧那卡爾斯基他們也在所不免的。

於是出版家的資本安全了，『第三種人』的旗子不見了，他們也在暗地裡使勁的拉

那上了絞架的同業的脚，而沒有一種刊物可以描出他們的原形，因為他們正握着塗抹的筆尖，生殺的權力。在讀者，只看見刊物消沈，作品的衰落，和外國一向有名的前進的作家，今年也大抵忽然變了低能者而已。

然而在實際上，文學界的陣綫卻更加分明了。蒙蔽是不能長久的，接着起來的又將是一場血腥的戰鬥。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註1) 這篇文章原是寫給現之中國 (China Today) 的，後來又由英文轉譯，載法蘭西版的國際文藝上。這裡作者向世界控訴戰時期中國反動的文學流派和國民黨的反動的文藝政策，這一類文章，散見於二六甲以下各集，這是一篇概括的文章。

(註2) 機噐的人，就是革命的助徒。崇尚這兩個字，應讀作卑賤的意思。

(註3) 「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就是「用武力這個武器取了天下，却不能够用同樣的武器來治天下」的意思；就是要圖劃左翼文學，還得用文學這個武器的意思；也就是反動文學是爲了「機噐人」的意思。

(註4) 機噐人，就是機噐人。

(註 6) 『中國文學的創子手』，魯迅用來當作一句反語。第三種人蘇汶說，左翼的文學批評，使第三種人要作而不敢，所以他們都擱筆了。因此，就誣說左翼批評家是「中國文學的創子手」。其實所謂第三種文學，壓根兒就不存在，原來就沒有第三種人，沒有第三種筆，沒有第三種文學，和左翼的批評無干。

(註 6) 蕭軍，蘇聯同路人作家。辛克萊，美國現代作家。梭羅古勃，俄國十九世紀作家。

(註 7) 改悔的革命家，也是革命叛徒的另一用語。

(魯迅全集三十卷：且介亭雜文)

空白页

玩笑只當牠玩笑（下）

別一枝討伐白話的生力軍，是林語堂先生（註1）。他討伐的不是白話的『反而難懂』，是白話的『魯里魯蘇』，連劉先生（註2）似的想白話『返樸歸真』的意思也全沒有，要達意，只有『語錄式』（白話的文言）。

林先生用白話武裝了出現的時候，文言和白話的鬥爭早已過去了，不像劉先生那樣，自己是混戰中的過來人，因此也不免有感懷舊日，慨歎末流的情緒。他一閃而將『宋明語錄』擺在『幽默』的旗子下，原也極其自然的。

這『幽默』便是論語四十五期裡的一張字條的寫法，他因為要問木匠討一點油灰，寫好了一張語錄體的字條，但怕別人說他『反對白話』，便改寫了白話的，選體的，桐城派的三種，然而都很可笑，結果是差『書僮』傳話，向木匠討了油灰來。

論語是風行的刊物，這裏省煩不抄了。總之，是：不可笑的只有語錄式的一張，別
的三種，全都要不得。但這四個不同的脚色，其實都是林先生自己一個人扮出來的，
一個是正生，就是『語錄式』，別的三个都是小丑，自裝鬼臉，自作怪相，將正生襯得
一表非凡了。

但這已經並不是『幽默』，乃是『頑笑』，和市井間的在牆上畫一烏龜，背上寫上
他的所討厭的名字的戰法，也並不兩樣的。不過看見的人，卻往往不問是非，就嗤笑被
畫者。

『幽默』或『頑笑』，也都要生出結果來的，除非你心知其意，只當牠『頑笑』看。
因為事實會不如文章，例如這語錄式的條子，在中國其實也並未斷絕過種子。假
如有工夫，不妨到上海的街口去看一看，有時就會看見一個攤，坐着一位文人，在替男
女工人寫信，他所用的文章，決不如林先生所擬的條子的容易懂，然而分明是『語錄式』
的。這就是現在從新提起的語錄派的末流，卻並沒有誰去塗白過他的鼻子。

這是一個具體的『幽默』。

但是，要賞識『幽默』也真難。我曾經從生理學來證明過中國打屁股之合理：假使屁股是爲了排洩或坐坐而生的罷，就不必這麼大，腳底要小得遠，不是足夠支持全身了麼？我們現在早不喫人了，肉也用不着這麼多。那麼，可見是專供打打之用的了。有時告訴人們，大抵以爲是『幽默』。但假如有被打了的人，或自己遭了打，我想，恐怕那感應就不能這樣了罷。

沒有法子，在大家都不適意的時候，恐怕終於是『中國沒有幽默』的了。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八日）

（註1）

歐雷克，美國博士，北京大學夏門大學的教授，一個典型的歐美派學者。舊時代，他多少還有自由主義的色彩，後三辦論辯字句，大倡『幽默』，則就顯露了本相。魯迅曾經幾次忠告他，不要再寫這種無謂的東西，老老實實的翻譯幾部有價值的英美文學的書。這則短評不妨說也算定他的評言。這篇文章的宗旨是揭示中國並沒有幽默。所謂幽默云云，其實不過是開玩笑。文章的尖刻，諷刺，又是魯迅式的短評的一個例證。

（註2）

劉先生就是劉半農。

（選自魯迅全集：花邊文）

空白页

論『第三種人』

(註1)

這三年來，關於文藝上的論爭是沈寂的，除了在指揮刀（註2）的保護之下，掛着『左翼』的招牌，在馬克斯主義裡發見了文藝自由論，列寧主義裡找到了殺盡共匪說的論客的『理論』之外，幾乎沒有人能够開口，然而，倘是『爲文藝而文藝』的文藝，卻還是『自由』的，因爲他決沒有收了虛布的嫌疑。但在『第三種人』，就是『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人』，又不免有一種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壇要說他是『資產階級的走狗』。

代表「這一種『第三種人』來鳴不平的，是現代雜誌第三和第六期上的蘇汶（註3）先生的文章。（我在這里先應該聲明：我爲便利起見，暫且用了『代表』、『第三種人』這些字眼，雖然明知道蘇先生的『作家三群』，是也如拒絕『或者』，『多少』，『影響』這一類不十分決定的字眼一樣，不要固定的名稱的，因爲名稱一固定，也就不自

由了。）他以為左翼的批評家，動不動就說作家是『資產階級的走狗』，甚至於將中立者認為非中立，而非中立，便有認為『資產階級的走狗』的可能，號稱『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第三種人』又要作而不敢，於是文壇上便沒有東西了。然而文藝據說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於階級鬥爭之外的，為將來的，就是『第三種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藝。——但可惜，被左翼理論家弄得不敢作了，因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了被罵的豫感。

我相信這種豫感是會有的，而以『第三種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我也相信作者所說，現在很有懂得理論，而感情難變的作家。然而感情不變，則懂得理論的度數，就不免和感情已變或略變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兩樣。蘇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來，是並不正確的。

自然，自從有了左翼文壇以來，理論家曾經犯過錯誤，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蘇汶先生所說，有『左而不作』的，並且還有由左而右，甚至於化為民族主義文學的小卒，書坊

的老板，敵黨的探子的。然而這些討厭左翼文壇了的文學家所遺下的左翼文壇，卻依然存在，不但存在，還在發展，克服自己的壞處，向文藝這神聖之地進軍。蘇汶先生問過：「克服了三年，還沒有克服好麼？」回答是：是的，還要克服下去，三十年也說不定。然而一面克服着，一面進軍着，不會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後行進那樣的傻事的。但是蘇汶先生說過『笑話』：左翼作家自從資本家取得稿費；現在我來說一句真話，是左翼作家還在受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的法律的壓迫，禁錮，殺戮。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殘，現在非常寥寥，即偶有發表，批評作品的也絕少，而偶有批評作品的，也並未動不動便指作家爲『資產階級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左翼作家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神兵，或國外殺進來的仇敵，他不但要那同走幾步的『同路人』，還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進。

但現在要問：左翼文壇現在因爲受着壓迫，不能發表很多的批評，倘一旦有了發表的可能，不至於動不動就指『第三種人』爲『資產階級的走狗』麼？我想，倘若左翼批

評家沒有宣誓不說，又只從壞處着想，那是有這可能的，也可以想得比這還要壞。不過這以爲這種豫測，實在和想到地球也許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殺一樣，大可以不必的。

然而蘇汶先生的『第三種人』，却據說是爲了這未來的恐怖而『擱筆』了。未曾身歷，僅僅因爲心造的幻影而擱筆，『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作者，又何其弱呢？兩個愛人，有因爲豫防將來的社會上的斥責而不敢擁抱的麼？

其實，這『第三種人』的『擱筆』，原因並不在左翼批評的嚴酷。真實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這樣的『第三種人』，做不成這樣的人，也就沒有了第三種筆，擱與不擱，還談不到。

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裏面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生在現在面要做給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頭髮，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

躁着，然而並非因爲有人搖了搖頭，使他不敢拔了的緣故。

所以雖是『第三種人』，卻還是一定超不出階級的，蘇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階級的批評了，作品裡又豈能擺脫階級的利害；也一定離不開戰鬥的，蘇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種人』之名提出抗爭了，雖然『抗爭』之名又爲作者所不願受；而且也跳不過現在的，他在創作超階級的，爲將來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於左翼的批判了。

這確是一種苦境。但這苦境，是因爲幻影不能成爲實有而來的。即使沒有左翼文壇作梗，也不會有這『第三種人』，何況作品。但蘇汶先生卻又心造了一個橫暴的左翼文壇的幻影，將『第三種人』的幻影不能出現，以至將來的文藝不能發生的罪孽，都推給牠了。

左翼作家誠然是不高超的，連環圖畫，唱本，然而也不到蘇汶先生所斷定那樣的沒出息。左翼也要託爾斯泰、弗羅培爾。但不要『努力去創造一些屬於將來（因爲他們現在是不要的）的東西』的託爾斯泰和弗羅培爾。他們兩個，都是爲現在而寫的，將來是

現在的將來，於現在有意義，才於將來會有意義。尤其是託爾斯泰，他寫些小故事給農民看，也不自命爲『第三種人』，當時資產階級的多少攻擊，終於不能使他『擱筆』。左翼雖然誠如蘇汶先生所說，不至於蠢到不知道『連環圖畫是產生不出託爾斯泰，產生不出弗羅培爾』，但卻以爲可以產生密爾朗該羅、達文希那樣偉大的畫手。而且我相信，從唱本說書裡是可以產生託爾斯泰、弗羅培爾的。現在提起密爾朗該羅們的畫來，誰也沒有非議了，但實際上，那不是宗教的宣傳畫，傳約的連環圖畫麼？而且是爲了那時的『現在』的。

總括起來說，蘇汶先生是主張『第三種人』與其欺騙，與其做冒牌貨，倒還不如努力去創作，這是極不錯的。

『定要有自信的勇氣，纔會有工作的勇氣！』這尤其是對的。

然而蘇汶先生又說，許多大大小小的『第三種人』們，卻又因爲豫感了不祥之兆——左翼理論家的批評而『擱筆』了！

『怎麼辨別』？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日)

(註1) 這是一篇批判第三種人文學的最有條理的文章，這篇論說和瞿秋白的文學的獨立和文學家的獨立，是互相媲美的雄篇。

(註2) 指揮刀就是國民黨的屠殺者。

(註3) 蘇文即杜南，革命的勳徒，所謂第三種人文學運動的首要分子。他們自以爲是中立的文學者，大嚷左翼勿侵入文學的談話，而事實上則是要壓制左翼文學的發展。更甚者，就當左翼文學被壓迫的時候，他雖不但一腔不響，反而參與這種清道的工作了。到了抗戰時期，杜南即蘇文竟當了漢奸文士。相隔四十年，在實踐上，就把自己塗成這麼一副尊容了。

(選自魯迅全集三卷：南京北湖書局)

空白页

二丑藝術 (註1)

浙東的有一處的戲班中，有一種脚色叫作『二花臉』，譯得雅一點，那麼，『二丑』就是。他和小丑的不同，是不扮橫行無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一味仗勢的宰相家丁，他所扮演的是保護公子的拳師；或是趨奉公子的清客。總之：身分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壞。

義僕是老生扮的，先以諫諍，終以殉主；惡僕是小丑扮的，只會做惡。到底滅亡。而二丑的本領却不同，他有點上等人模樣，也懂些琴棋書畫，也來得行令猜謎，但倚靠的是權門，凌蔑的是百姓，有誰被壓迫了，他就來冷笑幾聲，暢快一下，有誰被陷害了，他又去嚇唬一下，吆喝幾聲。不過他的態度又並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過臉來，向臺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點，搖着頭裝起鬼臉道：『你看這傢伙，這回可要倒楣』

哩！

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為他沒有義僕的愚笨，也沒有惡僕的簡單，他是知識階級。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長久，他將來還要到別家幫閒，所以當受着豢養，分着餘炎的時候，也得裝着和這貴公子並非一伙。

二丑們編出來的戲本上，當然沒有這一種腳色的，他那裡肯；小丑，即花花公子們編出來的戲本，也不會有，因為他們只看見一面，想不到的。這二花臉，乃是小百姓看透了這一種人，提出精華來，製定了的腳色。

世間只要有權門，一定有惡勢力，有惡勢力，就一定有二花臉，而且有二花臉藝術。我們只要取一種刊物，看他一個星期，就會發見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頌揚戰爭，忽而譯蕭伯納（註₂）演說，忽而講婚姻問題；但其間一定有時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對於國事的不滿：這就是用出末一手來了。

這最末的一手，一面也在遮掩他並不是幫閒，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類

型在戲臺上出現了。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日)

(註1)

三仕藝術是借戲台上的二丑，來比喻文壇上的某種幫閑文士的。這種人的特點是當他幫着公子的時候，一方面又故意向臺下的觀衆表示幾句不滿於公子的話，彷彿自己是最聰明的人，所以一到公子作惡身亡，他又一溜煙似的跑到別家去幫忙了。在官場上，昨日還是虞段與之同僚或幕客，而今日又是蔣之親信和爪牙的，就是這一流人。所說的不一定是那一個人，而是這一流人所固有的特性。

(註2)

蕭伯納，現代英國大文學家。

(選自魯迅三十年集：准風月談)

空白页

戰士和蒼蠅

(註1)

Schopenhauer (註2) 說過這樣的話：要估定人的偉大，則精神上的大和體格上的大，那法則完全相反。後者距離愈遠即愈小，前者却見得愈大。

正因為近則愈小，而且愈看見缺點和創傷，所以他就和我們一樣，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異獸。他仍然是人，不過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偉大的人。

戰士戰死了的時候，蒼蠅們所首先發見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嘖着，營營地叫着，以為得意，以為比死了的戰士更英雄。但是戰士已經戰死了，不再來揮去他們。於是乎蒼蠅們即更其營營地叫，自以為倒是不朽的聲音，因為他們的完全，遠在戰士之上。的確的，誰也沒有發見過蒼蠅們的缺點和創傷。

然而，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

去罷，蒼蠅們！雖然生着翅子，還能營營，總不會超過戰士的。你們這些蟲豸們！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註1） 革命者死了，有的自詡爲批評家之徒，就大肆吹求，評這個，論那個，緊鑼密鼓說個不停，彷彿在說：革命者一有缺點，就不行，而他自己倒是一個完全的人。北京時代的所謂學者，就用這種戰術來罵過孫中山及其他革命先烈，魯迅這篇短評，是針對着這些論客而寫的，把自詡爲完全的人的批評者，當作是一個蒼蠅。

（註2） Schopenhauer 即叔本華，德國哲學家。

（選自魯迅三十年集·華蓋集）

夏三蟲

(註一)

夏天近了，將有三蟲：蚤、蚊、蠅。

假如有誰提出一個問題，問我三者之中，最愛什麼，而且非愛一個不可，又不准像『青年必讀書』那樣的繳白卷的。我便只得回答道：跳蚤。

跳蚤的來吮血，雖然可惡，而一聲不響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蚊子便不然了，一針呷進皮膚，自然還可以算得有點徹底的，但當未叮之前，要哼哼地發一篇大議論，却使人覺得討厭。如果所哼的是在說明人血應該給牠充飢的理由，那可更其討厭了，幸而我不懂。

野雀野鹿，一落在人手中，總時時刻刻想要逃走。其實，在山林間，上有鷹鷂，下有虎狼，何嘗比在人手裡安全。爲什麼當初不逃到人類中來，現在却要逃到鷹鷂虎狼間

去？或者，鷹鷂虎狼之於牠們，正如跳蚤之於我們罷。肚子餓了，抓着就是一口，決不談道理，弄玄虛。被喫者也無須在被喫之前，先承認自己之理應被喫，心悅誠服，誓死不二。人類，可是也頗擅長於哼哼的了。害中取小，牠們的避之惟恐不速，正是絕頂聰明。

蒼蠅嗡嗡地鬧了大半天，停下來也不過舐一點油汗，倘有傷痕或瘡癤，自然更佔一些便宜；無論怎麼好的，美的，乾淨的東西，又總喜歡一律拉上一點蠅矢。但因為只舐一點油汗，只添一點腌臢，在麻木的人們還沒有切膚之痛，所以也就將牠放過了。中國人還不很知道牠能够傳播病菌，捕蠅運動大概不見得興盛。牠們的運命是長久的；還要更繁殖。

但牠在好的，美的，乾淨的東西上拉了蠅矢之後，似乎還不至於欣欣然反過來嘲笑這東西的不潔：總要算還有一點道德的。

古今君子，每以禽獸斥人，殊不知便是昆蟲，值得師法的地方也多着哪。

（一九二五年四月四日）

(註1) 蚤，蚊，蠅，是最討人厭惡的夏三蟲，然而動輒以禽獸斥人之古今君子們，其實則連昆蟲也還不如。這篇夏三蟲的主題也就在此。

(選自魯迅三十年集·雜著集)

空白页

學界的三魂 (註1)

從京報副刊上知道有一種叫國魂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說章士釗固然不好，然而反對章士釗的『學匪』們也應該打倒。我不知道大意是否真如我所記得？但這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為不過引起我想到一個題目，和那原文是不相干的。意思是，中國舊說，本以為人有三魂六魄，或云七魄，國魂也該這樣。而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罪魂』，還有一個是什麼呢？也許是『民魂』罷，我不很能夠決定。又因為我的見聞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國全社會，只好縮而小之曰『學界』。

中國人的官癮實在深，漢重孝廉而有埋兒刻木，宋重理學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則』。(註2)總而言之：那魂靈就在做官，——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頂着一個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於是那些人就得了雅號曰『匪』

徒』。學界的打官話是始於去年，凡反對章士釗的都得了『土匪』『學匪』『學棍』的稱號，但仍然不知道從誰的口中說出，所以還不外乎一種『流言』。

但這也足見去年學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學匪。以大點的國事來比罷：太平盛世，是沒有匪的；待到羣盜如毛時，看舊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當國，即使大打一通官話，那結果也還是『嗚乎哀哉』。當這『嗚乎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為盜，所以我相信源增先生的話：『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與強盜，其實是農民革命軍』。（國民新報副刊四三）那麼，社會不是改進了麼？並不，我雖然也是被諡為『土匪』之一，却並不想為老前輩們飾非掩過。農民是不來奪取政權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但這時候，匪便被稱為帝，除遺老外，文人學者却都來恭維，又稱反對他的為匪了。

所以中國的國魂裡大概總有這兩種魂：官魂和匪魂。這也並非硬要將我輩的魂擠進國魂裡去，貪圖與教授名流的魂為伍，只因為事實彷彿是這樣。社會諸色人等愛看雙官

諧，也愛看四杰村，望偏安巴蜀的劉玄德成功，也願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註3）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時候則豔羨官僚，受了官的剝削時候便同情匪類。但這也是人情之常；倘使連這一點反抗心都沒有，豈不就成了萬劫不復的奴才了？

然而國情不同，國魂也就兩樣。記得在日本留學時候，有些同學問我在中國最有大利的買賣是什麼，我答道：「造反」。他們便大駭怪。在萬世一系的國度裡，那時聽到皇帝可以一脚踢落，就如我們聽說父母可以一棒打殺一般。爲一部分士女所心悅誠服的李景林先生（註4），可就深知此意了，要是報紙上所傳非虛。今天的京報即載着他對某外交官的談話道：「予預計於舊歷正月間，當能與君在天津晤談；若天津攻擊竟至失敗，則擬俟三四月間捲土重來，若再失敗，再暫投土匪，徐養兵力，以待時機」云。但他所希望的不是做皇帝，那大概是因爲中華民國之故罷。

所謂學界，是一種發生較新的階級，本該可以有將舊魂靈略加滌洗之望了，但聽到『學官』的官話，和『學匪』的新名，則似乎還走着舊道路。那末，當然也得打倒的。

這來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國魂的第三種。先前不很發揚，所以一開之後，終不自取政權，而只『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纔有真進步。但是，當此連學界也倒走舊路的時候，怎能輕易地發揮得出來呢？在烏煙瘴氣之中，有官之所謂『匪』和民之所謂『匪』；有官之所謂『民』和民之所謂『民』；有官以爲『匪』而其實是眞的國民，有官以爲『民』而其實是衙役和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時仍不免爲『官魂』，這是鑑別魂靈者所應該十分注意的。

話又說遠了，回到本題去。去年，自從章士釗提了『整頓學風』的招牌，上了教育總長的大任之後，學界裡就官氣瀰漫，順我者『通』，逆我者『匪』，官腔官話的餘氣，至今還沒有完。但學界却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顏色；只是代表官魂的還不是章士釗，因爲上頭還有『減膳』執政（註5）在，他至多不過做了一個官魄；現在是在天津『徐養兵力，以待時機』了。我不看甲寅（註6），不知道說些什麼話：官話呢，匪話呢，民話呢，衙

役馬弁話呢？……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註1) 三魂就是官魂、匪魂、和民魂。魯迅是用這個來象徵社會上的三種人：官、民、匪。反動階級及其辯護人的慣技是把一切異己者都當作匪，先加這個罪名，然後來置他們於死地。魯迅這一篇文章則揭穿匪原是有兩種的：有官之所謂匪，和民之所謂匪，而其實，官之所謂匪即是民，而民之所謂匪，才是真正的匪。針鋒相對，這是一篇最富有戰鬥意義的名文。

(註2) 這是譏笑讀書人之熱中於做官的意思。

(註3) 這是說人們有各種不同的嗜好，和各種不同的看法。

(註4) 李景林是北京時代的車閥。

(註5) 執政就是段祺瑞。

(註6) 甲寅是章士釗所辦的雜誌的名字，文字是濫調的古文，內容是陳腐的思想，又因封面畫有一隻老虎，也被稱爲老虎報。

(選自魯迅三十正集：華蓋集續編)

空白页

送曹日漫筆

(註1)

坐聽着遠遠近近的爆竹聲，知道寇君先生們都在陸續上天，向玉皇大帝講他的東家的壞話去了，但是他大概終於沒有講，否則，中國人一定比現在要更倒楣。

寇君升天的那日，街上還賣着一種糖，有柑子那麼大小，在我們那里也有這東西，然而扁的，像一個厚厚的小烙餅。那就是所謂『膠牙餈』了。本意是在請寇君喫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嚼嚼學舌，對玉帝說壞話。我們中國人意中的神鬼，似乎比活人要老實些，所以對鬼神要用這樣的強硬手段，而於活人卻只好請喫飯。

今之君子往往諱言喫飯，尤其是請喫飯。那自然是無足怪的，的確不大好聽。只是北京的飯店那麼多，飯局那麼多，莫非都在食蛤蜊，談風月，『酒酣耳熱而歌嗚嗚』麼？(註2)不盡然的，的確也有許多『公論』從這些地方播種，只因爲公論和請帖之間看

不出蛛絲馬迹，所以議論便堂哉皇哉了。但我的意見，卻以爲還是酒後的公論有情。人非木石，豈能一味談理礙於情面而偏過去了，在這里正有着人氣息。況且中國是一向重情面的。何謂情面？明朝就有人解釋過，曰：『情面者，面情之謂也。』自然不知道他說什麼，但也就就可以懂得他說什麼。在現今的世上，要有不偏不倚之公論，本來是一種夢想；即使是飯後的公評，酒後的宏議，也何嘗不可姑妄聽之呢。然而，倘以爲那是真正老牌的公論，卻一定上當，——但這也不能獨歸罪於公論家，社會上風行請喫飯而諱言請喫飯，使人們不得不虛假，那自然也應該分任其咎的。

記得好幾年前，是『兵諫』之後，有鎗階級專喜歡在天津會議的時候，有一個青年憤憤地告訴我道：他們那里是會議呢，在酒席上，在賭桌上，帶着說幾句就決定了。他就是受了『公論不發源於酒飯說』之騙的一個，所以永遠是憤然，殊不知他那理想中的情形，怕要到二九二五年纔會出現呢，或者竟許到三九二五年。（註3）

然而不以酒飯爲重的老實人，卻是的確也有的，要不然，中國自然還要壞。有些會

議，從午後二時起，討論問題，研究章程，此間彼難，風起雲湧，一直到七八點，大家就無端覺得有些焦躁不安，脾氣愈大了，議論愈糾紛了，章程愈渺茫了，雖說我們到討論完畢後纔散罷，終於一闕而散，無結果。這就是輕視了喫飯的報應，六七點鐘時分的焦躁不安，就是肚子對於本身和別人的警告，而大家誤信了喫飯與講公理無關的妖言，毫不瞅睬，所以肚子就使你演說也沒精采，宣言也——連草稿都沒有。

但我並不說凡有一點事情，總得到什麼太平湖飯店、擷英番菜館之類裡去開大宴；我於那些店裡都沒有股本，犯不上替他們來拉主顧，人們也不見得都有這麼多的錢。我不過說，發議論和請喫飯，現在還是有關係的；請喫飯之于議論，現在也還是有益處的；雖然，這也是人情之常，無足深怪的。

順便還要給熱心而老實的青年們進一個忠告，就是沒酒沒飯的開會，時候不要開得太長，倘若時候已晚了，那麼，買幾個燒餅來喫了再說。這麼一辦，總可以比空着肚子的討論容易有結果，容易得收場。

膠牙錫的強硬辦法，用在竈君身上我不管牠怎樣，用之於活人是不大好的。倘是活人，莫妙於給他醉飽一次，使他自己不開口，卻不是膠住他。中國人對人的手段頗高明，對鬼神卻總有些特別，二十三夜的捉弄竈君即其一例，但說起來也奇怪，竈君竟至於到了現在，還彷彿沒有省悟似的。

道士們的對付『三尸神』，可是更利害了。我也沒有做過道士，詳細是不知道的，但據『耳食之言』，則道士們以爲人身中有三尸神，到有一日，便乘人熟睡時，偷偷地上天去奏本身的過惡。這實在是人體本身中的奸細，對神尊貴義常說的『三尸神暴躁，七竅生煙』的三尸神，也就是這東西。但據說要抵禦他卻不難，因爲他上天的日子是有一定的，只要這一日不睡覺，他便無隙可乘，只好將過惡都放在肚子裡，再看明年的機會了。連膠牙錫都沒得喫，他實在比竈君還不幸，值得同情。

三尸神不上天，罪狀都放在肚子裡；竈君雖上天，滿嘴是糖，在玉皇大帝面前含含糊糊地說了一通，又下來了。對於下界的情形，玉皇大帝一點也聽不懂，一點也不知道

，於是我們今年當然還是一切照舊，天下太平。

我們中國人對於鬼神也有這樣的手段。

我們中國人雖然敬信鬼神；卻以為鬼神總比人們傻，所以就用了特別的方法來處治他。至於對人，那自然是不同的了，但還是用了特別的方法來處治，只是不肯說；你一說，據說你就是卑視了他了。誠然，自以為看穿了的話，有時也的確反不免於淺薄。

(一九二六年二月五日)

(註1) 鄉下人對付要上天講壞話的瘟君的方法是用「膠牙錫」來粘住他的嘴，叫他不能開口，而官場學

者的法子則是用酒用飯叫他醉飽了，不想開口。魯迅這篇評論的用意是暴露所謂「公論」，其實不過是酒醉飯飽後的「公論」。

(註2) 這是蕭條冷落的意思。

(註3) 這是一千年或兩千年以後的事的意思。

(選自魯迅三十年集：華蓋集續編)

空白页

『死地』 (註1)

從一般人，尤其是久受異族及其奴僕鷹犬的蹂躪的中國人看來，殺人者常是勝利者，被殺者常是劣敗者。而眼前的事實也確是這樣。

三月十八日段政府慘殺徒手請願的市民和學生的事，本已言語道斷，只使我們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但北京的所謂言論界，總算還有評論，雖然紙筆喉舌，不能使灑滿府前的青年的熱血逆流入體，仍復蘇生轉來，無非空口的呼號，和被殺的事實一同逐漸冷落。

但各種評論中，我覺得有一些比刀槍更可以驚心動魄者在。這就是幾個論客，以爲學生們本不應當自蹈死地。那就中國人真將死無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悅誠服地充當奴子，『沒齒而無怨言』。不過我還不知道中國人的大多數人的意見究竟如何。假使也這樣

，則豈但執政府前，便是全中國，也無一處不是死地了。

人們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爲不易相通，殺人者便以殺人爲唯一要道，甚至於還當作快樂。然而也因爲不容易相通，所以殺人者所顯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夠做戒後來，使人民永遠變作牛馬。歷史上所記的關於改革的事，總是先仆後繼者，大部分自然是由於公義，但人們的未經『死之恐怖』，卽不容易爲『死之恐怖』所懾，我爲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但我却懇切地希望：『請願』的事，從此可以停止了。倘用了這許多血，竟換得一個這樣的覺悟和決心，而且永遠紀念着，則似乎還不算很大的折本。

世界的進步，當然大抵是從流血得來。但這和血的數量，是沒有關係的，因爲世上也儘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漸就滅亡的先例。卽如這一回，以這許多生命的損失，僅博得『自蹈死地』的批判，便已將一部分人心的機微示給我們，知道在中國的死地是極其廣博。

現在恰有一本羅曼羅蘭（註2）的 *Le Ser de L'amour et de La Mort* 在我面前，其中說：加爾是主張人類爲進步計，即不妨有少許污點，萬不得已，也不妨有一點罪惡的；但他們却不願意殺庫爾跋齊，因爲共和國不喜歡在臂膊上抱着他的死屍，因爲這過於沉重。

會覺得死屍的沉重，不願抱持的民族裡，先烈的『死』是後人的『生』的唯一靈藥，但倘在不再覺得沉重的民族裡，却不過是壓得一同淪滅的東西。

中國的有志於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屍的沉重的，所以總是『請願』。殊不知別有不覺得死屍的沉重的人們在，而且一併屠殺了『知道死屍的沉重』的心。

死地確乎已在前面。爲中國計，覺悟的青年應該不肯輕死了罷。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註1）這篇文章是對於『三一八』殺害瑞政府屠殺北京徒手請願民衆的抗議，同樣的文字收錄於華蓋集的，還有四五篇。

（註2）羅曼羅蘭，法國大文豪。

（選自魯迅三十年集：華蓋集）